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社会记忆的合法性根据

孙 德 忠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3)

[作者简介] 孙德忠(1971-),男,湖北襄樊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社会记忆是近年来频繁出现在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它的实质内容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过程。从哲学层面上提出和研究社会记忆,有人性论、生存论和认识论等三个方面的合法性根据。

[关键词] 社会记忆;人性论;生存论;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 B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2-0161-06

社会记忆是近年来频繁出现在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它的实质内容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过程^[1](第17-20页)。社会记忆所涉及的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某个局部领域和某种浅表层次,它是从主体的角度对于社会运动、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和多种样态的自觉透视、深层探索与总体反思,其超越于经验层面的总体性和反思性使它成为一个哲学概念而非作为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所能涵括。可以说,在对于社会结构及其运动的总体反思上,它是一个社会哲学的概念;在对于历史发展内在机制的深入探索上,它又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在对于文化样态及其传承脉络的综合把握上,它还是一个文化哲学的概念。将社会记忆这一原本属于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进行哲学移植和提升,或者从哲学层面上提出和研究社会记忆,其合法性根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人性根据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社会自身自我运动的产物,作为万物之灵,人的诞生及其发展标志着自然界的真正实现和最终完成。人虽然和动物一样依赖于自然界,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自然界,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人是有意识的精神存在物。人类意识——“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是一个藏幽潜微、奥妙难测的复杂系统,而记忆又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部分。动物由于没有发达的意识因而与它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它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换言之,动物由于不能把它的生命活动变成它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所以它与周围环境处于天然的和谐之中,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纯粹自然地联系着、自在地运动着。时间意识没有进入动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活动只有永恒的“现在”、“当下”和“在场”,其生命的过去和未来对它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动物既无对尚未到来的生命活动的企盼和设计,也无对已逝生命活动的记忆和保持。基督教所理解的神或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它是其自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超时空统一体,无生无灭,恒留常驻,因而

不需要或也无所谓记忆。

只有人这个有意识的存在物,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的生命活动“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2](第 57 页)。人不仅把外部自然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对象,并通过对象性实践活动即劳动实现二者的统一。实践活动是一个在目的、动机的推动下以指向未来的理想状态为宗旨并为意识和意志所自觉调控、自觉推动的物质性活动,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时间性展开和对象性实现。既有的实践结果构成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基础,现实实践活动的结果又以某种方式被保存下来成为新的实践活动的起点。因此,现实的实践活动必须了解并融汇过去的实践结果于自身,让记忆和历史能够服务于生活。尼采指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这种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的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且对知识感到满足的人的需要,它总是生活目标的一个参考,并处于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之下。这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与历史之间的天然联系。……只有为了服务于现在和将来,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3](第 25 页)这就是说,人并非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它直接地生活在当下的、现在的时空中,却又分明意识到过去的活动的延续,并积极展望和创造一个属于未来的理想。换言之,人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直接的、在场的世界(这个直接的在场的世界往往是十分有限的),它连结着、延续着一个间接的、不在场的、也是无穷无尽的世界,当下直接在场的世界只不过是那个无穷无尽的世界中凸现出来的一个点而已。人的过去的生活并没有真正消逝,也不可能消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记忆既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宿命,人就生活在记忆场中。当我们确认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物和历史存在物时,也同样确认了人是记忆存在物。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记忆的发展史。

从人的精神生活的构形来看,人的内心世界中充斥着由记忆堆积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精神材料。这些密集细微的精神材料之间相互联结、相互渗透,同时又相互排斥、相互离异,形成富有张力的记忆空间。记忆空间随生命的成长而不断拓展、延伸,甚至发生记忆空间的弯曲和扭缠。思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怀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寻根忆旧,革故鼎新,都是浸淫在迷迷糊糊却真切亲和的记忆之流中。人们在记忆的资源中发掘自己的本真和根柢,开显自己的需要和潜能,砥砺自己的意志和信心,鼓起面向未来的希望之帆。现实中人们的内心世界之悔悟与坦荡,昂扬与萎弱,自豪与谦抑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精神生活中所保存的记忆相关。可以说,正是由于对过去的记忆,才使人得以为人,使某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成为具有自身性格特点的特定的某人。相反,记忆之遗忘意味着人的本真自我之丧失,精神家园之沦落,甚至是人性的堕落。古代哲人苏格拉底说过,没有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也可以认为,没有记忆的生活也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它不是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没有记忆的生存是纯粹动物式的感觉直接性,所体验到的是平面化的没有任何深度的快感。只有人在记忆的比照下才能将动物式的快感提升为人的幸福,刻骨铭心的幸福和肝胆欲裂的痛苦乃是真正属于人的感觉,丧失了丰富敏锐的记忆的人只能成为追逐短暂感官享受的单面人。因此,葆有记忆和社会记忆,是人之为人的重要人性根据之一。

二、生存论根据

社会记忆的生存论根据在于它能破除现代社会中人在存在论、生存论意义上的理性坚执和工具化、功能化倾向,确立人类生存的实践具体性、精神全面性和文化丰富性。哲学的秘密在于人,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表现,是人对自身生存方式的积极自觉表达的理论形式,哲学的秘密就蕴藏在人以及人自身的生存方式之中,因此可以从历史上哲学理论的演变和更替中窥测、反观到人及其自身生存方式的发展轨迹,进而可以把握到社会记忆当代凸显的哲学生存论根据。

认识自我和把握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人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但世间万象的千变万化,

使人惊异不已;外在自然力量的强大和神秘、生存斗争的艰辛和困苦,使人焦虑恐惧。为了表达在生存能力十分低下的境遇中人的生存状况并从这种生存状况中超脱出来,人们往往力求从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中寻求绝对、静止、永恒的东西,并把它们作为现象世界的始基、本原或本质,在这个绝对、静止、永恒的东西里面就可以达到彻底的肉体平安、心灵宁静和精神满足,因而生存的意义和归宿也即在于向这个绝对、静止、永恒的存在提升和靠近。这种要求超越个人有限生命的超验体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得到了纯粹的表达。“哲学家的职责恰恰在于使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自由和独立”^[4](第161页),“灵魂这个不可见的部分,离开肉体到了一个像它自己一样实在、纯粹及不可见的地方……或不可见的世界去谒见至善和至明之神。”^[4](第130页)柏拉图关于“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划分,亚里士多德对“存在之所以存在”的追问,都是以哲学的方式将人的生存看成是人的灵魂对其肉体存在的不断超越和否定的过程。

这种将人之为、人自身生存的终极根据外在化为超验的本质和实体的表达方式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中达到了顶峰。宗教神学通过“原罪”和“救赎”观念来判定人的生存价值。由于无法摆脱的原罪,注定了人们现世生存的苦难,因而人生存的惟一目的就是赎罪以获救。人类生存的多方面内容,必须借助宗教神学的超验性得以实现,人的理性合法性、人的本质力量、人对绝对普遍性的心理渴求和现实追求都只有通过全知全能的实体性的上帝才能获得终极根据。不可否认,宗教神学这种将人的生命、世界的依据和局限性外在化为人类不能预计和控制的力量,是人类精神的实体性形而上学诉求,是在人类生存能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对自身生存性矛盾和现实社会关系的虚幻、颠倒的反映。马克思指出,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5](第452,453页)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宗教神学作为一种文化方式,的确较为成功地表达了人类永远无法回避的生存性悖论,它用对无限性的先知先觉意识替代了人们对生存有限性的自我意识,并充分肯定和张扬了人的精神性对物性的超越意义,显示了人类文化的某种富于深刻洞见的智慧。

但宗教神学毕竟是借助情感和信仰来缓解、超越人类的生存性矛盾的,而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则是通过理性和自觉的意志努力在缓慢地但却从未间断地拓展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空间,为自身争取越来越多的真实的自由。因此,理性的苏醒及其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势必造成宗教神学无法挽回的衰微。近代以来,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各个领域不断掀起反宗教的浪潮,其中最为强劲的一支乃是以理性和科学为支撑的世俗性现代化运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凯歌行进,作为其内核和基础的理性精神也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理性精神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人类的其它各种文化样式(包括宗教神学)排挤到了历史舞台的幕后,并成为一切文化样式和社会制度安排的最终检验标准和合法性依据。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6](第404页)

理性精神的普遍化造成了科学在技术和实践领域的巨大成功,在几千年人类历史及史前史中任何神都未能为人做的事情,人已经为自己做了。人们不仅沉湎于用数学——力学化的理性自然科学来认识世界,利用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手段即大机器生产来征服和改造外部世界,而且致力于用理性精神来高效率地安排社会生产和组织社会生活,甚至用它来解决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价值、信仰、世界观等问题。原来在宗教神学看来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都成了人的认识的对象,理性化、技术化的社会生产管理和日益专门化的社会分工使个人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这架机器中的一个可以被任意替换而与其个性全然无关的齿轮。人自身的生存(无论是现世的生存还是来世的轮回)都不再成为最终的目的,相反人却成为社会这架机器中发挥功能性作用的工具性存在。尼采在这个时代晨光微露之际发出的“上帝已死”的呼喊终于开始叩击人们日渐麻木、枯竭的心灵。人再也无法“成为他自己”,而成为一个个无差异

的“群众”(mass man)。在高效组织的社会生产和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面前,原来一直逼仄着人类的物质匮乏消除了,但同时理性的绝对化和普遍化却使人褪变成为外表强硬单一而内心干涸冷漠的“逻各斯”。雅斯贝斯尖锐地指出:“人就是这样被抛入了漂流不定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对于连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连续性的一切感觉,人不能保持其为人。这种生活秩序的普遍化将导致这样的后果,即把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7](第 36 页)人的这种自我迷失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之遗忘。

如何诊疗这种现代性的痼疾呢?精神的沉沦固然需要找到它的物质根源,并通过进一步拓展人的生存能力为它开辟出一条走出困境的现实途径,但同时它也需要精神的自我拯救,这就需要确立自觉的自我反省意识和自我批判能力。笔者认为,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切入,正是诊疗这种现代性痼疾的可能途径。由于社会记忆的观点着眼于对人类自身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在实践活动中对象性结果的凝聚、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过程,因而,它对于人类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不是从纯粹自然科学的角度以见物不见人的方式去理解,而是立足于主体能力的发挥和主体自身本质力量的实现,在主体实际地改变和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解。由于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内在相关性,客体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相一致,因此,这种对于对象、现实和客体的实践理解必然同时也是对主体的理解,是对主体能力和主体本质力量的返观和映照。在社会记忆的视野下,被理性所主宰的社会生活和冷冰冰的外部世界并不是全能的上帝的造物或某种神秘的绝对精神的外在显现,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属人世界。这样,就可能唤醒原来沉睡在上帝怀抱中那原本就是属人世界的人的精神和人的意识,就可能激活被普遍化理性化的僵硬世界中的属人的感性丰富性和具体性,从而也确证这个被异化了的世界的深层的属人本质。只有穿过被绝对化理性化的世界的刚性外观,去发掘、破译蕴润在理性化世界之中人性的光辉和诗意,复活被凝固在这个绝对化理性化世界之中的人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人才能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重新找回自己的本真之根,人才能真正成为人,成为他自己。雅斯贝斯曾经从反面表达了类似的洞见。他说,被机器所统治的“生活的基础在于忘却。它对过去与现在的视野缩小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除了赤裸裸的当前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留存于精神中。因此生活就按常规进行,没有记忆和预见,缺乏那可以通过有目的地、抽象地观照在这架机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获得的活力”^[7](第 43 页)。只不过他开出的药方是“历史的汲取”和“向历史的沉入”。

三、认识论根据

一般记忆是社会记忆的前提,它在认识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一切认识形式的功能性基础。但传统的认识论研究都忽视了记忆的存在,或者把记忆的存在及其功能实现作为人们所熟知的不证自明的前提,而社会记忆不仅在认识论中而且在整个哲学研究中更是几近空白。科学而完备的认识论需要从哲学上阐明记忆尤其是社会记忆在认识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

要确立社会记忆的认识论根据,首先就要破除对人类记忆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纯粹自然主义理解。人的认识世界至大至小、至精至微,既有理性因素,又有非理性因素。日常的生活经验和严格的科学研究都表明,记忆是人的意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构建和人类认识的增长都不可或缺。没有记忆能力和由记忆形成的认识背景,一切认识活动都将失去历史的和现实的基础;没有记忆机制随时随地的发生作用,认识活动将只能成为转瞬即逝的思维火花;进而没有记忆能力也无法产生富有内容的认识成果。丧失了记忆,甚至连最基本的人类活动、人类生活都无法正常进行,更谈不上复杂抽象的认识活动和高级的现实实践活动。可以说,记忆的结果及其累积恰如人类认识活动的“水库”,以前的认识成果都流入并保存在这个“水库”中;在这个“水库”中不同的记忆材料(作为已经形成的知识)之间相互回流、激荡、融汇的过程就是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之间发现新矛盾、新问题、新

联结,进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而任何现实的认识运动之开始必须从这个记忆的“水库”中启航;这个“水库”的标高决定着新认识运动的起点水平,它的流向规定着新认识运动的方向,它的成分与结构决定了新认识运动的内容和根基。

既然记忆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无论认识的理性形式和非理性形式都得到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偏偏记忆却被哲学家们忽略乃至完全遗忘了呢?为什么在人类认识和科学的发展中,记忆仅仅成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但却从未成为在哲学层面上反思的对象呢?应当承认,这与人们对记忆机制的无法确知和对于记忆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简单化理解有着密切的联系。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1版)中的“记忆”条目称,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识记即识别和记住事物特点及其间的联系,它的生理基础为大脑皮层形成了相应的暂时神经联系;保持即暂时联系以痕迹的形式留存于脑中;再现或再认则是暂时联系的再活跃。通过识记和保持可积累知识经验。通过再现或再认可恢复过去的知识经验。”《中国大百科全书》也认为,记忆是“认知过程中对信息的输入、存储和提取。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反映,包括识记、保持、再认或再现三个基本过程。识记是记忆的开始阶段,是信息的输入和编码。保持是识记了的信息在头脑中得以巩固的过程。再现也称回忆,是对已存储的信息进行提取,使之恢复活动”。上述两种对记忆的界定大致相同,都将记忆理解为人脑对所获信息的简单而机械的储存、保持和提取的单向流程,这是一种建立在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自然主义理解。在这种视野下,人的各种生理心理现象遵循着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规律,记忆的发生、积累、保存、提取、衰减、遗忘等在一切实体身上都是普遍一致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也不管人们的自觉程度如何,大脑这个高度复杂的物质器官总会记住一些东西,保存相应的一段时间,然后又按照遗忘的规律(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逐步递减,这是一个僵硬、呆板、机械的“客观”进程。这样,记忆就成了人脑的一种纯粹自然的机能。应当承认,现代心理学在这种视野下大量引进和使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类记忆现象,的确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对于解开大脑“黑箱”和人类记忆之谜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来自社会维度的哲学反思,这些成果未能揭示记忆与人类社会生活、人的社会本性之间的深层联系。

20世纪初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认为,记忆应当被看成是所有有机物的一个一般功能。如德国生理学家理查德·西蒙在1905年出版的《论记忆》中指出,记忆是一个同时服务于遗传和日常生活的基本过程,它是生物组织的一种原始的可塑性,正是这种可塑性,才使经验的效果得以在时间的流变过程中被保存。这种看法与我们上述所批判的关于记忆的自然主义理解如出一辙。当代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这种观点“远远没有解释记忆在我们人类世界中的作用和意义。人类学的记忆基质和记忆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要使记忆这个词在人那里具有意义,仅仅有‘对刺激物的以前反应的一个潜在残迹’那是不够的。单凭这些残迹的存在,单凭这些残迹的总和,并不能说明记忆的现象。”^[8](第64页)人类记忆不能被还原为简单的印迹复合,它包含着一个认知和识别的过程,包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观念化过程,“只有这种类型的回忆才能给我们以充分表现人类特性的记忆形态,并把它与动物或有机生命中的所有其它现象区别开来”^[8](第66页)。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中甚至认为,记忆乃是更深刻更复杂的一种现象;它意味着精神生活的内在化和强化,意味着我们以往生活的一切因素的相互渗透。由此柏格森形成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并且被看做是他的生命哲学的基石。

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对记忆现象的深入挖掘凸显了记忆与人类生活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人类记忆超越自然生理基础的社会本性和实践根源,这正是社会记忆应有的内涵。众所周知,人的任何自然属性和自然过程都已经被社会因素和社会过程所中介,人类记忆活动和记忆现象亦复如是。社会记忆对一般自然主义记忆观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它认为记忆是社会性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它更强调记忆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社会记忆的总体过程与心理学研究的记忆过程三阶段大体一致,但在每个阶段的发生机制上却有很大区别。如编码,个体记忆仅仅借助各种感官搜集外部信息并直接将它们转化为短时记忆,然后转化为长时记忆贮存。社会记

忆则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体系,将那些与实践活动有关的并能积极促进实践活动健康持续运行的信息进行编码;个体自然记忆的储存依赖于人脑中的一种叫做“海马”的物质,这种物质受到损伤则记忆将会受阻是甚至紊乱,而社会记忆的储存形式则依赖和表现为人类自觉创造的独立于人类个体的人工产品,特别在现代社会更产生了形式多种多样、容量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的贮存手段来保存已经编码的信息,它们不因个体的消亡而消亡,从而获得了超个体的存在;个体记忆的恢复和提取是由于受到了某些偶然因素的刺激而被唤醒,社会记忆的恢复主要取决于实践活动之需要,它总是有意识地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唤起某些记忆,并压抑另外一些记忆,启蒙和专制下的文化选择甚至制度建构与拆解都是如此;在遗忘方面,个体自然记忆的遗忘遵循心理学所揭示的“艾宾浩斯曲线”规律,另外还有“失用规律”和干扰理论,但社会记忆的遗忘遵循的更主要的是社会规律,是社会生活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社会记忆和社会遗忘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总之,从哲学认识论意义上阐明记忆的社会实质、社会机制和社会作用,可以突出心理学对记忆研究中社会性建构的缺失,它从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角度去看待人类记忆现象,现实的人类记忆并非自然记忆过程,而是实践——记忆模式的社会记忆过程。这种理解可以提高记忆活动的自觉性和效率,增强记忆的指向性并强化记忆的效果,以促进认识 and 实践活动更加有序高效地进行。

[参 考 文 献]

- [1] 孙德忠. 重视开展社会记忆问题研究[J]. 哲学动态, 2003, (3).
- [2] [德]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3] [德] 尼 采.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4] [古希腊] 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5]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6]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7] [德] 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8]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Validity Foundation of Social Memory

SUN De-zh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3, Hubei, China)

Biography: SUN De-zhong (1971-), male, Doctor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joring in Marxism philosophy.

Abstract: Social memory is a concept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ethnology in recent research. Its essential connotation is a bi-direction movement of congulation, stockpile, transl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objectifying result of human competence and essential power. Putting forward and studying social memory on the lay of philosophy, we have three validity foundation of humanism, existence and epistemology.

Key words: social memory; humanism; existence; epistemology